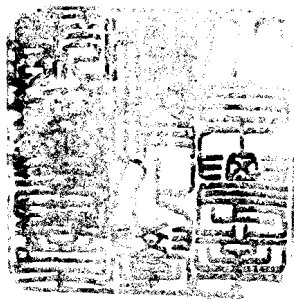


外国考察家
在我国西北

外国考察家 在我国西北



杨建新 马曼丽 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

杨建新 马曼丽 编著

责任编辑 刘 健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 印张 127 千字

193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2105·18 定价0.66元

序 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及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探险队”、“考察队”相继到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进行活动。这种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先后来华活动的外国“探险队”、“考察队”不下数十起，其中有俄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的，法国人的，瑞典人的，美国人的等等，尤以俄国人的“考察队”占的比重最大。

上述“探险队”、“考察队”的活动范围很广，包括我国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四川的一部分；活动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初主要是从事地理、地质、生物学的考察，以后逐渐扩大，涉及历史、考古、民族、语言、民俗、宗教、艺术、中西交往，以及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广大领域。考察队的主要成员回国后，发表了涉及上述地区的大量考察报告、游记、专著和图谱等，有的还举办了显示考察结果的展览会。

怎样看待这些人的考察活动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由于这些考察队情况各异，很难在它们之间完全划一个等号。但是，它们确实又存在着一些共同点，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会从中得出以下两点概括性的认识：

2563/36

(一) 这些考察活动是在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具体国家进行的，因此不能不带有当时当地的特点。

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由极盛而最终过渡到帝国主义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寻找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需要不断给自己开拓“日光下的地盘”。它们始而将世界瓜分完毕，随之又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激烈的争夺。在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便成了列强竞相掠夺的对象。外国考察队恰在这个时期纷纷来到中国，不能说同这一历史背景没有关系。自然，各国考察队在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内容上不尽相同：有的是政府派出，以“考察”为名掩护特务间谍活动的（这种人实际上不是考察家，本书也没有收入）；有的是半官方的，兼有科学考察和替本国政府收集一般情报的双重使命；有的是个人出面，同本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其考察的某些结果却为本国政府所利用。总之，不管考察队与本国政府的关系如何，也无论考察者本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及其是否意识到考察的政治含义，他们的活动总是离不开当时条件所赋予的时代特征。例如，有的考察队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就进入中国领土；有的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等地任意发掘古代遗址，窃走大量古籍、古画、木简、文书；有的将整块石雕或敲下石雕的某些部分盗运回国，一些珍贵壁画被切割下来，或用胶布粘下来，卷载而去。对我国古代遗址和文物肆意破坏和洗劫之所以可能，

主要是列强在中国享有殖民特权的结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奉行媚外政策及其昏庸无知，毫无保护文物的措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翻开当时某些“考察家”留下的游记或档案资料，不难看出，有些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抱着殖民主义者的偏见，怀有侵略扩张的欲望。特别是俄国的某些考察家，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毫不掩饰对中国人民的蔑视、侮辱和对中国大好河山的无穷贪欲。帝俄“考察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就曾不止一次地宣传到中国来要带着钱、枪和皮鞭这三件东西，并扬言只要给他一千名俄军，他就能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地区。其他一些考察家虽然不象某些俄国考察家那样，但它们总是免不了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为本国资产阶级的侵华政策服务，它们的考察也不可能是“纯学术”的考察。

（二）同时应该看到，十九世纪中下叶、二十世纪初，外国“考察队”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活动，与当时国际上“地理学”、“东方学”、“中国学”（又称“汉学”）等学科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各国“考察队”的来华，部分地是出自这些学科发展的需要，并反过来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地理学，尤其是自然地理学，在欧洲渊源较深。古希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地理学家，给欧洲地理学的发展留下了好的传统。

十五世纪欧洲掀起了寻找新航线、发现新大陆的热潮。与此相关，人们对世界自然地理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新的跃

进。十八世纪，德国的地理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相继出现了世界著名地理学家洪堡、李特尔等人。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经过探险、考察，自然地理面貌已基本清楚，但亚洲中心部分，特别是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对欧洲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神秘王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年）对我国一些地区，包括甘、青一带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写出了有关中国的一些地理著作，指出我国西北地区在地理学上及中西交往中的重要性，并绘制了《中国地图集》。然而他对这一带的地理状况，仍多属推测，不甚了了。在当时欧洲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地形、地貌大部分仍是空白。于是，上述地区也就成为众多外国“探险队”、“考察队”活动的目标。

欧洲人到我国西北进行考察活动，与欧洲“中国学”的发展，也分不开。

早在公元前的传说中，奇妙的赛里斯国^①就曾引起欧洲人的无限向往。十三世纪末，马可波罗的游记抄本先是在意大利，以后逐渐在全欧洲流传，书中关于辽阔富饶的“契丹国”的描述在欧洲诱发了一股中国热。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传教士来到我国，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法

① “赛里斯”为希腊语，意思是“蚕丝产地”或“贩丝人”。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西方已经把中国称作赛里斯国了。

国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在欧洲为中国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中国内地的历史和地理，很少涉及中国西北边疆。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学家们除了继续研究中国内地的情况外，在研究中国边疆地理、中国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的历史等方面，出现了不少专门家。十九世纪中叶，一些英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向欧洲介绍了和阗、库车、喀什、叶尔羌等地有古代城镇、寺院、石窟等遗址和大批古代文物的消息，这件事引起欧洲新兴的中国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成为他们纷纷到中国边疆进行考察的一个直接动因。

不能否认，有些考察家来到中国以后，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地理、历史、考古、民族、艺术等方面确实有所发现，甚至有重大发现，他们在研究中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对许多国家的西域史地学、敦煌学、中亚古代语言学及中外关系史等学术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成就，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一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其中的一些直到目前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整理、研究、介绍这些考察资料，吸收国外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中的积极成果，是开展我国边疆地区研究的一项亟待努力的工作。

总之，十九世纪中下叶、二十世纪初外国人对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考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历史现象。由于各该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插手或干预，以及考察者本人的立场及世界观的影响，这些考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列强对

半殖民地中国的扩张和侵略，这是不应该忽视的历史事实。但是必须指出，就大多数考察队而言，其考察的目的和动机往往是搜集情报和学术考察交织在一起，考察的结果往往是既有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文物的一面，又有取得积极学术成果的一面。因此，我们在评价上述考察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谨慎的、有分析的态度。应当坚决揭露和谴责某些考察家在中国的殖民主义行径，同时对考察中那些确有价值的发现和贡献，也应当予以适当的肯定。对于不同的考察队，也应分别具体情况，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目前，我国系统地介绍外国考察家在华活动的著作比较罕见。兰州大学历史系杨建新、马曼丽二同志所著《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作者在为数众多的外国考察家中，挑选了一些毕生从事考察活动，在考察中确有贡献，其主要考察活动又是经清政府批准了的人物，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笔调，扼要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的考察活动和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作为这方面素少研究的人和第一批读者之一的我，在阅读之余，深信本书能够为广大读者打开新的知识领域，并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刘 存 宽

1982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刘存宽
斯文·海定	(1)
一、走上探险之路	(1)
二、九死一生	(8)
三、沙漠中的骄子	(13)
四、塔里木河初航	(17)
五、古代楼兰和罗布泊	(23)
六、闯入西藏	(32)
斯坦因	(40)
一、帕米尔古道探索	(43)
二、埋藏在沙海中的瑰宝	(54)
三、丝路古道和汉代长城	(72)
四、藏经洞骗宝	(79)
伯希和	(85)
一、在欧洲中国学中心的陶冶下成长	(85)
二、中国学方面的成就	(94)
大谷光瑞考察队	(101)
一、三次探险概述	(101)
二、佛迹巡礼	(109)

三、丰富而珍贵的文物	(115)
波塔宁	(121)
一、阿尔泰山南北的居民和风光	(121)
二、在安多地区	(133)
科兹洛夫	(145)
一、从临时工到探险家	(145)
二、黑城——哈拉浩特	(153)
三、居延异彩	(164)
普尔热瓦尔斯基	(170)
一、穿越“流沙”	(173)
二、在阿古柏统治区	(179)
三、到玄奘历险的地方	(184)
四、何处觅源头	(186)
后 记	(196)

斯文·海定 (1865—1952年)

一、走上探险之路

斯文海定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从十二岁起，由于受当时欧洲兴起的探险和环球旅行热潮的影响，立志长大后要当一个旅行家去从事探险活动。他用了很多时间阅读有关北极探险的图书，甚至画出了他所知的各探险队的路线图，并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等待着能有机会到北极去探险。

二十岁的斯文海定从中学毕业了。在离校的那天，校长突然把他叫了去，对他说，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开办在巴库的一座炼油厂，从瑞典聘请了一位总工程师。这位总工程师要请一位家庭教师，随他全家到巴库，教他们的小孩，任期半年。校长希望斯文海定能应聘前往。斯文海定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这是实现自己旅行和探险的最好机会，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说服了父母，随同总工程师的夫人和孩子踏上了去里海的路程。他们乘船渡过波罗的海和劳兰湾，又从彼得堡乘车南下，到达里海海滨的巴库。

斯文海定在这里除了给孩子授课外，还观察了这块伸入

里海的阿普歇伦半岛上的亚洲风情。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会了鞑靼语和波斯语。这为他以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方便。

家庭教师的合同很快就到期了，他赚得了三百卢布的薪金。他决心利用这为数不多的钱，深入亚洲，去实现渴望已久的旅行和探险。

1886年4月，他乘船离开巴库南下，在巴列维港进入伊朗，游历了腊什特，然后越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西端，到达加兹温。这里是古代波斯的重要城市，被伊斯兰教徒尊称为“天堂之门”。波斯王坦马士一世在1548年建都于此，当时称作达里萨尔坦内特（“皇座”之意）。四十年后，波斯王大阿拔斯将京城迁至伊斯法罕，此地才逐渐萧条下来。在德黑兰，斯文海定得到任波斯皇宫御医的瑞典人海本涅特的帮助，使他得以饱餐德黑兰的名胜。

斯文海定在领略了波斯湾的风光后，又乘船西北溯底格里斯河，到达那历史上和文学中的古代名城——巴格达。此城建于公元762年，当时称达·厄斯·塞兰姆（即和平之地的意思）；1258年曾毁于蒙古军的西征，1401年又为帖木耳劫掠一空。在斯文海定游历此城时，昔日宏伟的建筑和繁荣的市容，已经只能在想象中加以描绘了。

在巴格达，斯文海定的口袋里总共只剩了一百五十个克郎（瑞典货币的基本单位），当他到达伊朗的克尔曼·沙赫（伊朗西部城市）时，已是身无分文，连买一块面包的钱也没有了。在他毫无办法的时候，忽然想起，曾听人说，此城

有一名叫亚加·穆罕默德·哈森的大商人，他的产业遍布欧亚，为人又极慷慨，经常对受困之人解囊相助。于是他登门求见。果然得到了此人的慷慨资助，使他得以回到斯德哥尔摩。

这次旅行，共费时五个月，游历了伊朗西部的名城、大刹和古代遗址，参观了两河流域古代巴比伦时期的遗址。初次的游历生活，对斯文海定以后的探险生涯，是一次实习。

1886年年底斯文海定返家后，先后进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高等学校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地理等专业。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当时正在柏林大学任教，斯文海定受教于他，对他今后专门从事中国沙漠高原的探险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1890年瑞典政府派往伊朗、土耳其的使臣需要一位兼通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翻译官。掌握了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斯文海定，被选中了。他欣喜若狂，决心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1890年4月使团起程，先到达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当年威震欧亚的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中心。受到土耳其皇帝阿卜都·哈米德二世的接待。然后到达德黑兰，受到伊朗国王那士勒登的接见。

出使任务很快就完成了，摆在斯文海定面前的问题却尖锐起来。通过这次出使，他完全可以跻身于瑞典外交官员的行列，但斯文海定却一直惦念着那对欧洲人、对地理学术界来说是神秘禁区的亚洲腹地。想要在地理学上做出贡献的理想

和信念终于战胜了一切俗念的诱惑，他在使团回国之前，向瑞典国王打电报，要求允许他从波斯起程东行，到亚洲内地进行游历和探险活动。瑞典国王鄂斯加很快表示赞成，并供给了他所需要的全部费用。

从此，斯文海定就踏上了探险之路。

斯文海定在我国西部沙漠高原地区的游历和探险共有八次，足迹遍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内蒙等地，特别是多次深入我国新疆、西藏等人迹罕到的沙漠、荒原地带，他的许多著作，对研究我国新疆、西藏等地的地理、考古、历史等问题，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他的第一次探险是在1890年6月到1891年春。这次探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俄国的中亚一带，在我国境内的时间很短。大约是1890年年底，他经过俄国费尔干纳盆地诸城到了俄国边境伊尔克什坦木，沿克孜勒苏河进入我国乌恰县和喀什。在这里逗留几天后，从喀什向西北溯 恰 克马克河从乌 恰 县的托鲁加尔特山口出境，横穿察提尔库里湖，游历了伊塞克湖，于1891年春返回斯德哥尔摩。

斯文海定回到瑞典后，立即着手准备以我国沙漠高原为目标的第二次游历和探险活动。同时，他继续听完了李希霍芬有关中国和亚洲地理的课程，准备了五百五十多张我国西北地区的地图。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893年10月16日从斯德哥尔摩动身，经中亚，来到帕米尔地区。他对帕米尔高原的许多湖泊进行了测量和考察以后，由哈克拜塔尔山口进入我国境内，并对慕士塔格山进行了考察。

慕士塔格山又被称为冰山之父，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阿克陶县的交界处，是昆仑山的高峰之一，当地柯尔克孜人和塔吉克人把慕士塔格山看作圣山，对它有许多神话传说。斯文海定曾三次试图登上它那七千七百多米的高峰，结果都失败了，但他考察了慕士塔格山的数条巨大冰川，登上了五千多公尺的高度，并在覆盖着万年积雪的山坡上，渡过了一个难忘的高山之夜。以后他又来到叶尔羌河右岸的麦盖提县，从这里向东北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和阗^①河。在这次横穿沙漠的探险活动中，他损失了全部仪器，自己也只是很侥幸地保存了性命。

斯文海定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第三次探险是1895年底。在第二次探险中遭到损失后，他未曾回国，而是到俄国中亚地区继续进行探险考察活动，等候新的仪器的到来。1895年年底仪器运到后，他从喀什起程，考察了我国新疆许多地区，在地理学和考古学上，都有重大发现。

1896年5月斯文海定结束第三次考察，回到和阗，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又开始了他的第四次考察活动。这次他由新疆到达青海，经武威北上，过贺兰山西经内蒙到北京。在北京曾受到当时主持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李鸿章的接见和宴请。然后经蒙古、西伯利亚取道俄国于1897年5月回国。

归国后，斯文海定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并给予他崇高

① 今为和田。为保持当时名称，本书均作和阗。

的荣誉。他很快成了闻名于全欧洲的人物。

但是，沙漠高原和对欧洲人神秘莫测的我国西北名山大川吸引着他。在他回到斯德哥尔摩两年之后，于1899年6月再一次离开家乡，对我国西北进行第五次探险活动。这次他得到瑞典国王鄂斯加和著名的诺贝尔的经济上的支持。这次探险活动主要是沿塔里木河到达罗布泊洼地，发现了楼兰遗址，并对罗布泊洼地进行了探索。然后又从新疆东南部，越阿尔金山入西藏，于1902年1月27日返回斯德哥尔摩。

斯文海定在家中渡过了三年时间，整理他旅行和探险所得资料，写出了八卷本（包括两卷地图）的《中亚细亚的一个旅行家对科学的贡献》一书。同时积极准备着下一次的旅行。

1906年8月底，斯文海定第六次到我国进行考察活动。这次考察的目标主要是中国西藏。他在谈到这次考察的目的时说：直到“1906年皇家地理学会所出版的地理杂志上的最近的西藏地图中，那河流（雅鲁藏布江——引者）的北面的空白上只有‘未经考察’几个字。我的志愿是要消灭西藏地图上那几个字，再补上山脉、湖泊、河流准确的名字，而且尽力从各方面经过那空白处”^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克什米尔的列城出发，越过喀拉昆仑山，进入我国西藏北部，经藏北高原南下至日喀则，受到了九世班禅的接见，然后顺

① 斯文海定《我的探险生涯》，孙中宽译，《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33年版，250—251页。